



当代西方教育 史学流派研究

周采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西方教育 史学流派研究

周采等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项目号:13YJA880112)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当代西方教育史学主要流派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的关联;新文化史对于西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从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探讨了其与教育史研究的关联;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美国课程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教育史编纂的主要模式;当代史学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该书为我国学者提供了西方教育史学的基础性研究,是我国西方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 / 周采等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13-19368-1

I. ①当… II. ①周… III. ①教育史—史学流派—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8887 号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

著 者: 周 采等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制: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32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9368-1/G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9.25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64366274

导 论	001
一、研究西方教育史学的意义	001
二、西方史学嬗变与史学流派	003
三、西方教育史学的演进与教育史学流派	006
四、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	009
第一章 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	017
第一节 民族主义及其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影响	017
第二节 民族国家与美国早期教育史学	025
第三节 德国教育史学的民族传统	038
第二章 西方教育修正派教育史学	048
第一节 美国修正派教育史学	048
第二节 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	055
第三节 西方主要国家的修正派教育史学	060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派	06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教育史研究	062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	068
第三节 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	077
第四章 多元文化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	095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美国教育史研究	095
第二节 美国教育史学的多元文化课题	109



第五章 新文化史与教育史学	122
第一节 新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	122
第二节 新文化史视阈下的西方教育史学	128
第三节 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西方儿童史与教育史研究	137
第六章 全球史视阈下的教育史研究	148
第一节 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148
第二节 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和理论方法	151
第三节 全球史与教育史研究	154
第七章 西方城市教育史学	158
第一节 西方城市教育史学概说	159
第二节 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研究	163
第三节 西方主要国家的城市教育史学	176
第八章 西方女性教育史学	181
第一节 西方女性教育史学的兴起	181
第二节 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发展研究	187
第三节 英国和加拿大的女性教育史学	198
第九章 美国课程史学	205
第一节 美国课程史学史鸟瞰	205
第二节 美国课程史学史的史观分殊	210
第三节 克里巴德课程史观的隐喻书写	223
第十章 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234
第一节 当代史学趋势与教育史研究	234
第二节 关于教育史编纂的若干思考	246
参考文献	257
索引	289
后记	300

导 论

西方教育史学史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西方教育史著述的一种反思,其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认识基础和参照标准,有助于我国的西方教育史学研究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获得新的发展。西方教育史学史发生过几次重要转向: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来是叙述史学的复兴或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近年来,又兴起了全球史(the global history)热潮。在国际史学潮流和教育变革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些重要转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传统教育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化的新教育史学;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后现代叙事史学影响下又转向新文化教育史学;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全球取向历史学(a more globally oriented history)的影响,从而形成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和趋势。

一、研究西方教育史学的意义

西方教育史学史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与以研究教育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同,教育史学史以教育史学本身为自己的反思对象,其主要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提供认识的基础和参照标准。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有助于拓宽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我们不仅要研究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还应从教育史学自身的发展这一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如果说教育史学是指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的教育史发展过程进行重建的主体化历史,教育史学史则以教育史学本身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于教育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反思的再反思。它探讨作为人类自我认识形式之一的教育史学科的起源、发展脉络、演化原因、一般趋势等问题。人们对于教育发展历史的主观认识是否准确和科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育史学史对它的反思。例如,传统教育史学著作和新教育史学著作在教育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模式上有各自



的特点和利弊,如果我们不对其进行反思,就会在史料的选择和历史评论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出现错误。

从事西方教育史研究的学者无疑需要具备一些西方教育史学史方面的知识。如果只从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视角去探究西方教育的历史传统,而忽略从西方教育史学自身这一视角去观察和认识有关问题,可能会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文献的选择和理解上存在局限。例如,传统教育史学注重“述”,因而在史料的考证和选择上非常认真和严谨,而新教育史学家长于文本的分析、解构和批判,但在史料的考证上有时就缺乏严肃性。如果我们缺乏这些教育史学史的常识,就会出现扬其短而避其长的尴尬局面。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西方教育史学自身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在引进中避免出现盲目性和片面性。

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有助于优化西方教育史研究。史学史是具有通论性质的知识。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史学“博物馆”的说明书或解说词,即是说它对读者认识历史著作及其中蕴含的思想,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可以带领读者在博物馆内进行一次浮光掠影的旅行。例如,西方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史料的选择问题。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我国的西方教育史研究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和盲目性。西方教育史学史的研究不仅能为研习者提供一个参考书目,还可以帮助其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史料,有效地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

西方教育史学史是一门交叉学科,要求研究者兼具教育学、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功底。教育史编纂是教育史学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传播教育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所谓教育史编撰学主要讲教育史学著作的编写方法,是教育史学工作者如何向外输出自己研究成果的问题,是整个教育史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教育史编撰学是教育史学著作编写的总结,它把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理论原则,用以指导教育史学著作的编写工作。当代教育史学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要求对教育史的各个方面进行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求对教育及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高度的综合叙述。因此,教育史学史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各种教育史学著作形式,帮助教育史学工作者更好地运用适合时代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史学著作形式。

教育史学具有历史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性质。在西方教育史学发展初期,以职业取向,即师资培训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19世纪下半期,西方教育史学传统模式逐渐形成:信奉直线进步史观,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以编年的方

式描述由近代民族国家主导的学校教育制度尤其是公立学校制度的历史发展。20 世纪中叶前后国际史学发生新的转向,其总的趋势是从传统史学转向新史学,即社会科学史学,其主要特征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公开承认史学家主体的作用;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这种趋势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

二、西方史学嬗变与史学流派

教育史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在其发展初期更多地受到学校教育学的影响,主要目标是职业取向,即师资培训,通过教育史教学使未来教师建立起对本职业的信念和信心。在当代一些国家中,教育史作为一门课程已逐渐退出教师教育,但作为重要学术研究领域的教育史研究却方兴未艾。历史学是教育史的母学科,西方史学源远流长。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 484—约公元前 425)所著的《历史》的问世,被视为史学在西方开始成为一门初立学问的标志。“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历史约略在公元前 450 年到公元前 430 年间诞生于希腊。所谓历史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针对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种详尽的、世俗的、散文的叙事,而且以上这些条件每一项都必须具备。”^①在中世纪,基督教开创了线性史观,历史被视为一维的、分阶段的和不断向天国靠拢的历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开创了近代考证史料的传统,导致对档案的历史研究。18 世纪,又确立了史学家的研究应不偏不倚和以真实性为准绳的基本原则。19 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拓展了历史考据法(critical method),其结果是史家首要关切的是基于档案分析的政治史。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在方法论和理论假说方面仍然依赖 19 世纪历史学家的学说,即在历史学与科学之间进行严格限制,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

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G. G. Iggers)在《20 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将 20 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二是中期阶段,历史学面临社会科学的挑战;三是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②鲁滨逊(J. H. Robison,1863—1936)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

① [英]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 20 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 页。

② [美] 伊格尔斯:《20 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在《新史学》(1912)中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呼吁历史学应与社会科学学科携手共进,以拓展和深化历史研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 1908—1984)认为“推动 1955 年前后开始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①并研究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和人口学对历史学的影响。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史学中出现了各种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主要有定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还有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结构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新叙事史的复兴趋势较为明显。在社会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史学中先后出现了各种流派,如新社会史、计量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西方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环境史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与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关系较为密切的有以下三个史学流派:

一是新社会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社会史是历史学中一个很难界定的学科领域,被用来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历史。新社会史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史(social history)而言的。“18 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②传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都可追溯到 18 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F. Voltaire, 1694—1778),他将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商业、饮食起居和人口状况等囊括在历史研究之中。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是由 20 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推崇整体历史观,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研究的风格和方法。新社会史家关注生活和闲暇的历史,强调社会整体的历史,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新社会史家将其所研究的问题与整个社会历史密切联系起来,主张“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广泛关注社会集团和社会活动,注重普通人集团的历史。新社会史家将种族、性别和年龄作为衡量和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于是出现了各种群体史,如黑人史、移民群体史、妇女史、儿童史、青年史和老年史等。民众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社会史中最稳定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新开辟的领域还包括社会教育史、健康社会史、死亡史和感情关系史等。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揭示了社会变迁的文化和感情的原因。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总称。如果我们以 20 世纪之始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 页。

②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8 页。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从历史上看,1848 年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之间的严重分歧。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历程,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入大学。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及西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做法,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危机,引起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思潮流,这一阶段主要以卢卡奇(C. Lukacs,1885—1971)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札记》(1923—1937)为主要代表。20 世纪 40—60 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以及法国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1918—1990)等。在新史学的促进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成为西方史坛的劲旅,在继续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同时,也将研究拓展到精神状态史、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大众文化史、农民史和反抗史等领域。

三是后现代主义史学(postmodernism)。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和人文科学的历史转向(historic turn)的夹击下,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出现了危机。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在西方兴起,并在欧美国家广为流传。后现代主义史学包括两个部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流派。从诠释学(hermeneutics)视角看,历史是文本(text);从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的视角看,历史是话语(discourse)和历史是叙事(narratives);从人类学视角看,历史是文化。在“后现代主义转向”(postmodernism turn)影响下出现了诸多史学流派:(1)新叙事史(the new history of narrative),主要包括微观史(microhistory)和日常生活史(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2)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或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e history)。新文化史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文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989),社会文化史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术语,其第四代领军人物夏尔蒂埃(R. Chartier,1945—)希望通过人们形成的表象(representation)来重构社会,即通过文化史的新途径重新回到社会史。新文化史有很多分支领域:一是政治文化史,主要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这在美国和法国的史学界发展得较好;二是实践和表象史,年鉴派第四代史学家夏尔蒂埃致力于教育史、书籍史、



阅读史和文化制度的研究。与他齐名的科尔宾(A. Corbin)则以研究感官史(history of sense)而享誉史坛。

三、西方教育史学的演进与教育史学派

西方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教育史学的传统模式形成,其基本特点是:直线进步史观、自上而下的视角、思想和制度两分法、学校教育史和叙述取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出现了以贝林(B. Bailyn)和克雷明(L. A. Cremin)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并对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史学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劳工阶级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新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教育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当代教育史学科的职业取向渐趋淡化,甚至退出教师培训课程的背景下,学术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却呈现方兴未艾和繁荣昌盛的局面。

(一) 传统教育史学的形成

西方教育史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史或文艺复兴时期,尚处于综合性的通史范围。一般认为西方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的德国,曼格尔斯多夫(C. A. Mangelsdorf)的著作《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1779)是教育史框架的开端。美国教育史家布里克曼(W. W. Brickman, 1913—1986)指出:“教育史学的作者们倾向于认为,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真正开始研究教育史。”^①继曼格尔斯多夫之后还有鲁科夫(F. E. Rohkopf)的《德国学校教育史》(1794)和尼迈尔(A. H. Niemeyer)的《教育与教学原理》(1796)。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也是西方教育史走向专业化的时代。德国史家劳默尔(K. Raumer, 1783—1865)的《文艺复兴至今的教育史》(1847)被视为西方教育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施密特(K. Schmidt)的《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文化生活有机联系中的教育史: 1860—1862》则将教育置于广泛的文化和国际视野下进行研究。施密德(K. A. Schmid)及其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从古至今的教育史》是最具有综合性的教育史研究。

^① [美] 威廉·W. 布里克曼:《教育史学: 传统、理论和方法》,许建美译,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根据布里克曼的记载,1839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史作为一门课程的,很明显是斯托(C. E. Stowe)在《师范学校与教师学院》(*Normal Schools and Teacher's Seminaries*)中的建议”。^① 被誉为美国教育史学开山祖的巴纳德(H. Barnard, 1811—1900)在其主办的《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上连载的教育史料大部分是劳默尔著作的译文。第一本美国教育史专著是布恩(R. G. Boone)的《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9)。戴维森(T. Davison)的《教育史》(*A History of Education*, 1900)突破了以往为教育家树碑立传的窠臼,认为历史是人类进化的记录,教育则是人类自觉的进化。作为这种进化的记录,教育史应当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分支。

(二) 从传统教育史学到新教育史学

国际史学在20世纪中叶前后发生了一次转向,总的趋势是从传统史学转向新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和不同流派的理论,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为西方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多种理论视角。教育史学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从事教育史研究,在教育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转变。

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修正派教育史学挑战了传统思想史的统治地位。1989年,坎宁安(P. Cunningham)概括了英国新教育史学的三个特征:对教育史学的“辉格”(Whigs)传统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从关注教育思想转向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运用了社会科学的技术和定量方法。^② 澳大利亚研究者关注下层社会群体的体验,研究家庭、社会团体及儿童概念的演变,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教育史上阶级和性别关系等重要领域。^③ 1999年,罗德韦尔(G. Rodwell)撰文《澳大利亚的节制、优生学和教育:1900—1930》,从优生学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前30年澳大利亚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发展引起了法国学者的兴趣,促使年鉴学派开始关注教育史,并促使教育史学者注重从整体和宏观的视角研究教育史,从研究精英人物转向以往不被重视的社会下层民众的教育。1978年,黑兹利特(J. S. Hazlett)从新史学视角重新审

① [美]威廉·W.布里克曼:《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许建美译,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② Peter Cunningham,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The Past Decade of Engl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9(2), p.78.

③ Vick, Malcolm, *Individuals and Social Structure: Recent Writ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ustralia*,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7(1), pp.63-74.



视了法国学校教育。1983年,雷翁(A. Léon)出版了《法国民众教育史》。1992年,吉米(S. Gemie)在《什么是学校? 规定和控制 19 世纪早期的法国初等学校》中研究了法国民众教育。^①

(三) 新文化教育史学的兴起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认识论式微,对现代史学理论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大写历史”(History,指历史哲学)和“小写历史”(histories,指历史编纂学理论)遭到批判和否定。此外,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和人类学等也反抗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以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反历史(anti-historical)倾向,重视对历史、过程与情境的考察,并在此过程中对历史学科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具体的每个人的经验的重新强调导致重新回到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文化史”的兴起。新文化史又被称为新新史学(the new new history)或“新的老史学”(the new old history)。新史学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新新史学则偏重心态(mentalities)文化史,主要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微观研究,放弃了新史学所倚重的计量方法和分析问题取向而回归叙述,主要依靠直观的分析判断来处理资料和形成解释。

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教育史家开始关注语言对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史家科恩(Sol Cohen)是较早运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教育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语言学转向使得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语言本身即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仅将语言视为一种方法论工具”。^② 新文化教育史重视对小人物的微观研究,口述史料、私人档案、小说、日记、信件、家谱和庭审档案等变得极其重要。玛丽莲·托拜厄斯(Marilyn Tobias)在《达特茅斯学院的试验: 19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Old Dartmouth on Tri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982)一书中细致描述了达特茅斯学院史上学生、校友和教师联合起来迫使故步自封的管理者进行改革的经过。查德·加菲尔德(Chad Gaffield)的《语言、学校教育与文化冲突: 安大略法语争议的起源》(*Language, Schooling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① [法] 安多旺·莱昂:《当代教育史》,樊惠英、张斌贤译,光明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96 页。

② Sol Cohen, *Challenging Orthodoxies: 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ix.

Language Controversy in Ontario, 1987)一书被视为运用微观史学研究教育史的优秀作品。

(四)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多元化发展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 G. Iggers)通过对“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历史写作的总体考察,总结出全世界历史写作的五种趋势:第一,向文化史和语言学的转向,其重要结果就是“新文化史”的产生;第二,女权主义和性别的历史;第三,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联合的重新定义;第四,对民族主义历史的新挑战;第五,世界历史、全球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历史。^①近年来,西方教育史学从学校教育领域逐步扩展到种族、性别、儿童和少年文化、家庭史等领域,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转向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上述变化是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和人类学等共同促成的。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会赞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关于“历史叙事的本质是虚构”的观点,但他的研究的确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叙述本质的关注和讨论。

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些研究者一如既往地关注学校教育(schooling),另一些学者则研究其他非正规教育设施。^②一方面,对学校教育感兴趣的人们继续从事制度化教育发展的历史研究,而这一派中既有保守传统流派,也有激进的各种派别。另一方面,研究“大教育”(education)史学的流派、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学流派、少数民族教育(尤其是研究黑人教育)史学流派、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流派和多元主义教育史学流派等,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选取不同的史料,并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美国教育史学提出自己的解读或阐释。

四、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

有学必有派。所谓学派(school)是指在学术研究与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学术价值观念、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共识的群体,有一批代表性人物和被同行认可的学术创新成果。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各种教育史学流派,如修正派教育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学等。各流派都有自己

^① 贺五一:《冷战后世界历史写作的新趋势——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南京大学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第140—143页。

^② Robert L. Church、Michael Katz、Harold Silver & Lawrence A. Cremin, Forum: The Metropolitan in American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9(3), pp.419-446.

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同时,不同流派之间又存在交叉和相互影响,甚至边界模糊的复杂状况,并在劳工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表现出来。下面介绍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几个主要流派。

(一) 修正派教育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教育史学发端于美国,继而影响欧美其他国家。1960年,美国历史学家贝林在已成为当代名篇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1960)中抨击了以卡伯莱(E. P. Cubberley, 1868—1941)及其著作《美国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9)为代表的美国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并被视为美国“新”教育史学的宣言书。继贝林之后,对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修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以贝林和克雷明为代表的温和路线;二是以凯茨(M. Katz)和斯普林(J. Spring)等为代表的激进路线。^①

温和派教育史学是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映。“冷战”时期的到来使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先前颇为流行的以强调冲突为特征的“冲突学派”(Conflict school)被抛弃,转而强调以美利坚民族和谐的“一致论”(Consensus)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温和派的主张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开始兴起的关于“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非正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非正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及“终身教育”(life long education)等理念的影响,认为非正规教育在人们的观念、情感和信念等发展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温和修正派在使美国教育史学科回归历史学主流,以及使教育史研究向社会史和心智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和修正派特别关注教育在形成所谓“美国特性”中的作用,试图从对“教育”的重新定义入手,拓展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② 克雷明三卷本的《美国教育》(*American Education*, 1970, 1980, 1988)被视为温和修正派教育史学的重要代表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修正派教育史学中的激进修正主义者(radical revisionists)较为活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激进派力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教育史学的价值观,把美国公立学校视为统治者和资本家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1968年,凯茨在《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① 周采:《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② 周采:《美国教育史学中的温和修正派》,《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年第2期,第49—52页。

Reform, 1968)一书中批判统治者和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展公立学校教育,并将其价值观强加给工人阶级和穷人。美国激进派的其他作品还有拉泽逊(M. Lazerson)的《都市学校的起源:马萨诸塞的公立教育》(*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 Public Education in Massachusetts, 1870—1915*, 1971),斯普林的《教育和公司国家的兴起》(*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1972),鲍尔斯(S. Bowles)与金蒂斯(H. Gintis)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和经济生活的矛盾》(*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1976)。

加拿大最早受到美国修正派教育史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拿大学者在贝林的影响下,摒弃了用历史直线发展模式描述教育历史发展的传统。20世纪70—80年代,凯茨移居加拿大,对安大略等英语地区教育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1975年,凯茨和麦汀利(P. H. Mattingly)主编的论文集《教育和社会变迁》认定加拿大公立教育就是一种“免费的、官僚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以及具有阶级偏见的”机构。^①加拿大教育史学家对先前被忽视的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如土著居民的后代在实行种族隔离寄宿制学校里的经历;工人阶级家庭子女为使公立教育符合自己的利益所做的抗争;来自各国的移民为避免子女被公立教育同化所做的努力和所遭遇的挫折,以及妇女为在男性占主导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付出的艰辛等。

修正派教育史学对战后欧洲大陆的教育史学也产生了影响。德国学者认为,有三个特征最终成了新教育史学的代名词:第一,明确批判了风格华丽的辉煌传统,自觉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研究教育机构和教育过程。第二,将研究重点从教育理论的发展转向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第三,为了贴近人民大众,许多新著作都使用了社会科学的概念。^②但美国修正派教育史学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有限的。一方面,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都有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一般来说,新教育史学在这些国家有自己特定的表现形态。例如,法国新教育史学主要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深刻影响,倡导从整体、宏观、群体和问题等视角去研究教育史的演变与发展轨迹。又如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与新兴的社会史学派几经博弈,在理论上捍卫并发展了兰克的历史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努

① M. B. Katz & I. E. Davey, School Attendance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a Canadian City: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78(3), pp.271—294.

② K.H. Jarausch, The Old “New History of Education”: A German Reconsider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6(2), pp.225—242.



力,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从危机走向了复兴,依然深刻影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教育史编纂。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学者对美国式的新教育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保持教育史学的独立性。^①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在当代西方诸多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的理论和方法,运用社会文化学方法对阶级进行综合考察,并吸收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总体社会史观的指导下进行了具有创意的包容社会各方面的理论模式。20世纪60—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的有益结合催生了许多有创新意义的史学作品,并对社会史取向的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汤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963)一书中研究了英国历史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被视为广义的英国工人阶级教育史。“汤普森成功引入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经验’概念,从过程中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从文化纬度理解平民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用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②

1960—1991年,西蒙(B. Simon, 1915—2002)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英国教育史,^③其中第一卷《两个国家与教育结构: 1780—1870》(*The Two Na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1780—1870*, 1964)和第二卷《教育与劳工运动: 1870—1920》(*Education and the Labor Movement, 1870—1920*, 1965)集中探讨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在他看来,19世纪末所形成的英国教育结构充分反映出阶级色彩:为上层子弟而设的教育和为劳工子弟而设的教育俨然置身于两个国家之中。西蒙从阶级冲突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了英国教育体制形成的原因,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为积极争取教育权利进行不懈斗争的历程,突破了英国传统教育史研究的辉格派史学传统,朝着社会史研究方向发

① M. Heinemann, *The New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urope*,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7(1), pp.55—62.

② 张文涛:《E.P.汤普森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82—89页。

③ 西蒙的四卷本教育史分别是:第一卷是《教育史研究, 1780—1870》(*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1780—1870*, 1960),后易名为《两个民族和教育结构: 1780—1870》(*The Na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1780—1870*, 1974);第二卷是《劳工运动和教育, 1870—1920》(*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1870—1920*, 1965);第三卷是《教育改革的政治, 1920—1940》(*Politics of Educational Reform, 1920—1940*, 1974);第四卷是《教育与社会秩序, 1940—1990》(*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1940—1990*, 1991)。